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前言	vi
第一章 中国译学话语研究的时代背景	1
<hr/>	
1.1 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	2
1.1.1 统计和分析	2
1.1.2 数据库验证	4
1.2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	6
1.2.1 英国	7
1.2.2 西班牙	9
1.2.3 美国	10
1.2.4 加拿大	11
1.3 翻译研究的先进国家	12
1.3.1 比利时	13
1.3.2 奥地利	14
1.3.3 德国	14
1.3.4 以色列	15
1.3.5 芬兰	16
1.3.6 其他国家	17
1.4 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17
1.4.1 走向国际	18
1.4.2 渐入主流	18
1.4.3 自主创新	19

1.4.4	存在的问题	20
1.5	小结	24
第二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研究概述	26
<hr/>		
2.1	基本概念	26
2.1.1	范畴	27
2.1.2	概念	28
2.1.3	术语	29
2.2	中国译学话语的历史分期	30
2.2.1	前学科阶段	30
2.2.2	准学科阶段	32
2.2.3	学科建构阶段	37
2.3	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路线	38
2.3.1	由中国传统文论生发	38
2.3.2	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	39
2.3.3	从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40
2.3.4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41
2.4	中国译学话语的建设途径	42
2.4.1	挖掘传统术语	43
2.4.2	提炼现代概念	45
2.4.3	借鉴国外范畴	45
2.4.4	完善已有表述	47
2.5	小结	49
第三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概念框架	51
<hr/>		
3.1	译学的“一体三环”	52
3.1.1	何谓“一体三环”	52

3.1.2	以时间为经	54
3.1.3	以关联学科为纬	55
3.1.4	以“一分为三”为方法论	56
3.2	译学本体	57
3.2.1	本体的形成	58
3.2.2	本体的发展	58
3.3	内环：语言学	59
3.3.1	语言学的翻译研究	60
3.3.2	语言学对译学的意义	62
3.3.3	语言学术语融入译学本体	63
3.4	中环：关联学科	63
3.4.1	中环的形成	64
3.4.2	中环的作用	64
3.4.3	中环的意义	66
3.5	外环：文化与技术	69
3.5.1	文化学派	69
3.5.2	文化转向	70
3.5.3	翻译技术	71
3.6	小结	72

第四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范畴体系 74

4.1	佛经翻译时期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75
4.1.1	翻、译 / 翻译	78
4.1.2	本 / 经	79
4.1.3	文 / 质	80
4.1.4	中和 / 和合	81
4.1.5	言 / 语	82
4.1.6	口授 (译) / 笔受	83

4.1.7	格义	83
4.2	近现代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85
4.2.1	信达雅	85
4.2.2	神似/化境	86
4.2.3	直译/意译	87
4.2.4	归化/西化(洋化、欧化)	88
4.2.5	翻译标准	89
4.2.6	翻译批评	90
4.2.7	翻译方法、翻译技巧	91
4.3	当代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92
4.3.1	翻译教学	93
4.3.2	变译	93
4.3.3	应用翻译	94
4.3.4	翻译策略	94
4.3.5	翻译规范	96
4.3.6	跨学科翻译研究	96
4.3.7	翻译技术	97
4.4	译学范畴的传承与嬗变	98
4.4.1	古代译学范畴的传承	99
4.4.2	传统译学范畴的嬗变	100
4.5	小结	103

第五章 中国译学术语的创新与发展 105

5.1	术语的特征	106
5.1.1	科学性	106
5.1.2	专业性	107
5.1.3	单义性	108
5.1.4	其他	110

5.2	不同时期的译学术语	110
5.2.1	译学术语的萌芽期	111
5.2.2	译学术语的发展期	112
5.2.3	译学术语体系的创建期	115
5.3	译学术语发展的途径	117
5.3.1	赓续传统	118
5.3.2	创新术语	120
5.3.3	借鉴外论	121
5.3.4	融合翻译技术术语	124
5.3.5	借用关联学科术语	126
5.4	外来术语	127
5.4.1	外来术语的翻译	128
5.4.2	外来术语的定名	131
5.4.3	外来术语的本土化	133
第六章 译学话语的跨学科研究：转向、途径与模式		138
6.1	概念	139
6.1.1	双学科研究	139
6.1.2	多学科研究	140
6.1.3	超学科研究	141
6.2	转向	142
6.2.1	多重转向	142
6.2.2	语言学转向	143
6.2.3	文化转向	144
6.2.4	生态转向	146
6.2.5	社会学转向	147
6.2.6	技术转向	148
6.2.7	认知转向	149

6.3	途径	150
6.3.1	文艺学途径	151
6.3.2	文化途径	151
6.3.3	生态学途径	152
6.3.4	交际学途径	152
6.3.5	语言学途径	153
6.3.6	后语言学途径	154
6.3.7	社会符号学途径	155
6.4	跨学科研究的模式	157
6.4.1	找到汇合点	157
6.4.2	借用理论	158
6.4.3	借用方法	159
6.4.4	借用理论与方法	159

第七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创新与问题 161

7.1	译学话语中的翻译学	161
7.1.1	73种翻译学鸟瞰	162
7.1.2	数据分析	165
7.1.3	理论源头	166
7.1.4	对“学”的认识	167
7.2	译学研究的类型	169
7.2.1	形而上的研究	169
7.2.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169
7.2.3	外围学科的横向研究	170
7.2.4	传统译论的系统研究	171
7.3	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172
7.3.1	跨学科的广度	172
7.3.2	跨学科的深度	173

7.4	创新之路	174
7.4.1	自创新论	175
7.4.2	传承与发扬	176
7.4.3	“引进 + 本土化”	177
7.5	存在的问题	179
7.5.1	翻译学的盲目细分	179
7.5.2	强征其他学科概念	180
7.5.3	传统译论的转换之难	181
第八章 关联学科对中国译学话语的贡献		183
8.1	跨学科的三个交叉中枢	183
8.1.1	语言转换与加工	185
8.1.2	哲学思维与伦理	188
8.1.3	社会文化与规范	192
8.2	语言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195
8.2.1	语际转换过程	196
8.2.2	转换过程中话语信息的传递	199
8.2.3	语言单位在话语转换中的对应关系	201
8.3	生态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201
8.3.1	语境与译境	202
8.3.2	翻译生态	204
8.3.3	翻译环境	206
8.3.4	翻译生态环境	209
8.4	文体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212
8.4.1	翻译的得体	213
8.4.2	词句的得体	215
8.4.3	篇章的适切	217
8.4.4	文体的相应	218

8.5	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219
8.5.1	翻译的社会性	220
8.5.2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	221
8.5.3	卡隆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224
8.5.4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226
	参考文献	228

中国译学话语研究的时代背景¹

建构中国译学话语是我国过去 20 年的核心课题之一。在我国，现代翻译学的建立过程既有传承和发扬传统译论的一面，而更多的是像其他学科一样，又有引进、消化、融合、创新的一面。“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求实现传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徐国利 2011：94）中国译学话语是一套与时代背景、文化基因、价值观念等要素密切关联的符号系统和叙事结构，其产生恰逢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纵观当代国际翻译学科的发展，各国的翻译研究或进或退，或上或下，此起彼伏：有的后来居上，擢升前位；有的步履维艰，落在后面；也有的创新不断，一路领先。21 世纪以来，我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加强，建设译学话语的呼声日隆，学界以中国的现实和立场为出发点，积极寻求与西方对话，主要表现是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量骤增，近年已超越西班牙，名列第一。现将有关数据及国内外概况综述如下。

1 本章部分参考笔者《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兼论 21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一文（原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3 期）。

1.1 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

为掌握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笔者曾对1989年至2014年间五份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与传播进行了逐期的统计分析，对其中部分论文做了重点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于2020年主导编写出版了《语言学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选：翻译研究》。在这五份国际期刊中，创刊最早的是1954年的翻译期刊 *Babel*，最晚的是2012年创刊的 *Translation Spaces*。*Babel* 发表了较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能较普遍反映国际译联各成员的学术成果。在统计年间，*Babel* 共发论文171篇，作者国别涉及36个国家，平均每个国家发文4.75篇。其中，尼日利亚高达11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篇，约旦6篇。这些国家的作者在其他国际期刊上发文寥寥。*Target* 主要刊发欧洲国家作者的文章，我国学者在该期刊上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少，只有香港特区的个别学者的文章被刊登。与之相比，我国学者在 *Perspectives* 和 *Babel* 上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多。

1.1.1 统计和分析

下面是五份翻译学术期刊的简介及发文数量统计分析。

1.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简称 *Babel*)，创刊于1954年，是最早的翻译专业期刊，也是国际译联会刊。
2.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 *Target*)，由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于1989年创刊，其编委成员均为世界一流的翻译研究专家。
3.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简称 *Perspectives*)，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翻译及词典学研究所编辑，是国际主流翻译期刊之一。1996年第1期为中国专刊。

4.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创办于 2006 年，是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
5. *Translation Spaces* 创刊于 2012 年，是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多学科、多媒体、多语种翻译学术刊物。

由表 1.1 可见，西班牙、中国、美国、英国的发文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四国的文章总数占表中国家发文总量的 76.2%，可认为是国际翻译研究界的第一梯队。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的发文量居中。以色列、德国、法国等国的发文量近些年来止步不前。

表 1.1 2004/2005 年起的 10 余年间五刊的发文详情及排名（前 10）

排序	国家	发文总数	占总发文 628 篇的 %	Babel 2004-2013 年共 171 篇		Target 2005-2014 年共 103 篇		Perspectives 2005-2014 年共 192 篇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6-2014 年共 139 篇		Translation Spaces 2012-2014 年共 23 篇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1	西班牙	106.5	17.0%	50	29.3%	20.5	19.9%	43	22.4%	4	2.9%	5	21.7%
2	中国	96.25	15.3%	47.5	27.8%	5	4.9%	54	28.1%	2.75	2.0%	2	8.7%
3	美国	81.33	13.0%	12	7%	3.5	3.4%	10.83	5.6%	40	28.8%	3	13.0%
4	英国	63	10.0%	16	9.4%	22.5	21.8%	18.5	9.6%	11	7.9%	0	0
5	加拿大	28	4.5%	10	5.8%	9	8.7%	6	3.1%	5	3.6%	2	8.7%
6	比利时	27	4.3%	7	4.1%	11	10.7%	3	1.6%	8	5.8%	1	4.3%
7	澳大利亚	18.3	2.9%	3	1.8%	5	4.9%	3.3	1.7%	6	4.3%	2	8.7%
8	以色列	15	2.4%	3	1.8%	8	7.8%	2	1.0%	7	5.0%	0	0

(待续)

(续表)

排序	国家	发文总数	占总发文628篇的%	Babel 2004-2013 年共171篇		Target 2005-2014 年共103篇		Perspectives 2005-2014 年共192篇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6-2014 年共139篇		Translation Spaces 2012-2014 年共23篇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9	德国	10.16	1.6%	0	0	6.5	6.3%	2.66	1.4%	1	0.7%	0	0
10	法国	10	1.6%	0	0	8	7.8%	1	0.5%	1	0.7%	0	0

各国的发文数与期刊的主办机构、研究取向等有关。例如,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是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 在美国编辑, 荷兰出版, 创刊后的前两年(2006—2007)发表美国作者论文19篇, 占比为70.4%。其中, 论文作者尤以来自联合主编布莱恩·詹姆斯·贝尔(Brian James Baer)所在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师生为多。

1.1.2 数据库验证

为了验证以上统计结果, 弥补来源期刊的不足和缩短距今的出刊年份, 下面引用王立松、张旭姣(2022)检索Web of Science数据库14种SSCI和A&HCI来源期刊的统计结果(见表1.2)加以验证, 该研究的检索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21年。

表1.2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14种翻译学来源期刊中国学者的发文情况(2005—2021)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版国家	刊期	收录情况	论文总数	中国学者发文量	中国学者发文量占比	国际排名
1	<i>The Translator</i>	英国	季刊	SSCI, A&HCI	531	39	7.34%	3

(待续)

(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版国家	刊期	收录情况	论文总数	中国学者发文量	中国学者发文量占比	国际排名
2	<i>Translation Studies</i>	英国	四月刊	SSCI, A&HCI	516	24	4.65%	5
3	<i>Target</i>	荷兰	季刊	SSCI, A&HCI	475	47	9.89%	3
4	<i>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i>	英国	四月刊	A&HCI	419	6	1.43%	7
5	<i>Babel</i>	荷兰	双月刊	SSCI, A&HCI	484	146	30.17%	1
6	<i>Perspectives</i>	丹麦	双月刊	SSCI, A&HCI	425	110	25.88%	1
7	<i>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i>	英国	季刊	SSCI, A&HCI	383	49	12.79%	3
8	<i>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i>	荷兰	四月刊	SSCI, A&HCI	262	31	11.83%	2
9	<i>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i>	匈牙利	半年刊	SSCI, A&HCI	234	31	13.25%	2
10	<i>Interpreting</i>	美国	半年刊	SSCI, A&HCI	240	34	14.17%	1
11	<i>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i>	英国	半年刊	SSCI, A&HCI	238	24	10.08%	3
12	<i>Translation Review</i>	美国	四月刊	A&HCI	223	20	8.97%	2
13	<i>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i>	比利时	年刊	SSCI, A&HCI	208	18	8.65%	3
14	<i>Meta</i>	加拿大	季刊	A&HCI	388	27	6.96%	4

表 1.3 发文量前十国家 / 地区的论文总数及被引频次 (2005—2021)

序号	国家	发文量/篇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 (去除自引)	篇均被 引频次	h指数
1	英格兰	665	2,487	2,259	3.74	25
2	中国	606	1,068	782	1.76	12
3	西班牙	548	1,891	1,662	3.45	18
4	美国	500	1,166	1,087	2.33	16
5	加拿大	274	642	604	2.34	11
6	比利时	238	970	883	4.08	16
7	意大利	189	577	540	3.05	14
8	澳大利亚	179	736	680	4.11	14
9	苏格兰	174	360	338	2.07	10
10	法国	142	275	265	1.94	9

数据来源的扩大和统计时间的靠近,使得结果更接近现状。对照表 1.1 和表 1.3 的前十名单,可以发现,居前者大致相符。

1.2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是指在翻译研究方面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其特征为系统的翻译研究开展得较早、有著名学者引领、有完善的翻译教育体制、国际发文量名列前茅且引用率较高。这里指英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四国。

1.2.1 英国

英国具有深厚的人文学术土壤和根基，其翻译研究渊源深远、传统深厚，名家云集、新人辈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一路领先。二战后，翻译研究蓬勃兴起，翻译中的语言现象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翻译的语言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社会语境学派的创始人 J. R. 弗斯 (J. R. Firth)，他开启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此后，约翰·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等加入，逐渐奠定了英国作为世界语言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地位。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 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翻译理论。卡特福德在该书中借用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的系统语法及其对语言层次的分类来说明翻译转换现象，将翻译分为完全翻译 (total translation) 和受限翻译 (restricted translation)，并分别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和处理。纽马克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特别是以其代表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 所提出的“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著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 运用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学的理论来解释语言，被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谭载喜 (2009a: 217) 认为，“(斯坦纳的) 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在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人类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相互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活动’”。巴兹尔·哈蒂姆 (Basil

Hatim) 是最早把话语分析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其主要译学论著包括与伊恩·梅森 (Ian Mason) 合著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 以及《作为交际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文化转向”的号角在英国华威大学吹响。作为文化翻译学派旗手的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于 1990 年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书序言中描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这一由玛丽·斯内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首先提出的“文化转向”话语在翻译研究领域普泛化,引领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之维。90 年代中期,注入当代科技成果的翻译研究新范式——语料库翻译研究起步。*The Translator* 的主编莫娜·贝克 (Mona Baker) 及其团队于 1995 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创大规模可比语料库——翻译英语语料库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 简称 TEC) ——并创立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开辟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途径。

进入 21 世纪,英国学者又引领多学科、多媒体、多视角的翻译研究,召开了多次国际翻译学术会议。2001 年 7 月,巴斯内特在华威大学召开以“翻译与协调” (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 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大众传媒、广告学、文学、艺术史等多学科领域,在新的语境下进一步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途径。同年,曾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主席的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 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主题为“翻译的跨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他承担的重大项目“东西方的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借用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理论史、比较文学及描写翻译学的理论分析,研究东西方翻译理论的越界对

话。此外，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按国籍是英国人，长期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对翻译理论多有贡献（详见 1.3.5）。除了上述名家外，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以及何塞·迪亚兹-幸塔斯（Jorge Díaz-Cintas）等学者在新世纪也多有成果问世。

英国学者在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中引领学科进步，开译学范式创新之先，成就卓著。

1.2.2 西班牙

从表 1.1 和表 1.3 可见，近二十年来西班牙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国际发文量一直名列前茅，在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特别是在视听翻译研究和本地化研究方面成就显赫。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 PACTE（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小组的多项研究成果为国际译界广为认可和引用。该小组于 1997 年成立，一直致力于译者翻译能力的研究，通过对职业译者及翻译教师具体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建构了翻译能力构成模型以及翻译习得模式。该研究小组（PACTE 2005）指出，翻译能力并非单纯的双语转换能力，而是由六种子能力构成：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翻译知识子能力、心理-生理要素。“值得注意的是，PACTE 模型已经被迅速运用到职业译者训练，其中以 2005 年正式启动的‘欧盟笔译硕士’（EMT）项目最具影响力。……目前已有来自 16 个欧盟成员国的 34 所高校正式开办。”（王传英 2012：35）

西班牙有完备的翻译教育体系。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班牙多所学校就办有翻译学刊，主要讨论语言和翻译教学，也涉及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后来，巴塞罗那大学的翻译与跨文化小组于 2006

年创办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网络半年刊 *Transfer* 影响最大。

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的安东尼·皮姆 (Anthony Pym) 是西班牙译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国际译联主席，著述颇丰。其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 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翻译，凸显翻译与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本翻译史研究的世界名著。他在其中提出的关于翻译能力的极简方案 (minimalist approach) 在欧洲颇有影响。他也是翻译与当代科技相结合的研究者和创导者，在其编著的《移动的文本：本地化、翻译和发布》(*The Moving Text: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tribution*, 2004) 中提出本地化文本是不断地被翻译和发布的移动文本。皮姆也是 *Translation Spaces* 和 *Target* 等多种国际期刊的顾问或编委。

1.2.3 美国

与英国、中国、西班牙相比，美国的发文量略占下风。图里生前对美国学者在 *Target* 中的边缘化并不感到惊讶。对此，他有两点解释：“一、奈达之后，美国翻译研究界总体被边缘化，这与其对 *Target* 在‘意识形态’平台上讨论这门学科的认识有关；二、*Target* 和这门学科的许多内容长期受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Toury 2009: 197) 图里同时指出，这跟美国 2006 年创办的学术期刊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不无关系。美国的 81 篇论文中有 40 篇发表于此。这份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会员的学术利益。

实际上，美国的翻译研究队伍阵容强大，拥有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玛丽亚·提莫志克 (Maria Tymozko)、赫伯特·C. 托尔曼 (Herbert C.

Tolman)、道格勒斯·鲁宾逊 (Douglas Robinson)、埃德温·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等一批世界译坛翘楚,他们在传统研究方面并不显眼,但在翻译的文化研究、翻译技术研究以及与新兴学科结合等方面走在前列。

除了2006年创办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之外,2012年美国又创办了 *Translation Spaces*,由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格雷戈里·什里夫 (Gregory M. Shreve) 和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黛博拉·福拉隆 (Deborah Folaron) 联合主编。这是一份多媒体、多学科、多语言相结合的杂志,它把人们对翻译的视界引向更广阔的领域。该刊代表了当今翻译研究的前沿,认为翻译具有全球性和跨学科性,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复合系统,人们从中共享知识、信念和价值。该刊积极鼓励研究者从不同领域,如通信论、信息技术、经济、商业、法律、管理、科学、新闻、娱乐等不同视角切入翻译研究 (Folaron & Shreve 2012)。

美国是本地化需求最大的市场,在翻译技术方面领先,本地化研究活跃。根据崔启亮 (2015: 71) 的研究,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论述本地化的著作《本地化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to Localization*) 是莱博智公司 (Lionbridge) 副总裁伯特·埃斯林 (Bert Esselink) 于2000年所著。2004年,海瑟·麦克斯韦·钱德勒 (Heather Maxwell Chandler) 系统阐述游戏本地化的专著《游戏本地化手册》(*The Game Localization Handbook*) 问世,把翻译拓展到了娱乐业。

1.2.4 加拿大

加拿大在表 1.3 中名列第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是加拿大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 (Sherry Simon) 和路易

斯·冯·弗洛图 (Luise von Flotow)。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其背后的权威机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妇女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 (Paul St-Pierre) 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 挑战广为接受的后殖民理论，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探讨了在马来西亚、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和南美等地区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当代西方相关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

翻译史研究也是加拿大的强项。其代表人物让·德利尔 (Jean Delisle) 曾任国际译联翻译史委员会主席，在拓展翻译史研究领域，特别是译者及其译作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史学家对翻译评估的可行性研究手段等方面均有贡献。长期以来，口译史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领域。目前，朱迪斯·伍兹沃思 (Judith Woodsworth) 正在带领她的团队研究口译史。她认为，口译活动稍纵即逝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难度。

安妮·布里塞特 (Annie Brisset) 是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的创始人、加拿大翻译协会前主席，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项目顾问。她的专著《翻译的社会学批评：魁北克的戏剧与异域性 (1968—1988)》(*A Socio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atre and Alterity in Quebec, 1968-1988*, 1996) 最早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现象。

1.3 翻译研究的先进国家

翻译研究先进国家是指学术影响力次于主流国家，但在国际译

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有的在以往的研究中表现突出。以下介绍比利时、奥地利、德国、以色列、芬兰等国。

1.3.1 比利时

比利时在表 1.3 中名列第六。比利时是一个多语国家，其首都布鲁塞尔也是欧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其官方语言为荷兰语（主要在北方地区使用）、法语（主要在南方地区使用）和德语（主要在东部边界地区使用）。比利时国内有多所翻译学院。其中，安特卫普大学的翻译学院是欧洲委员会等国际机构招聘工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名誉院长弗兰克·皮特斯（Frank Peeters）以音视频翻译闻名，担任国际口笔译高等教育机构常设会议组织（CIUTI）¹ 主席。

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20 世纪 80 年代移居美国）是文化学派的旗手之一，由他提出的学科名称“Translation Studies”被广为接受。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若泽·朗贝尔（José Lambert）长期从事描写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翻译文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描写研究方法及微观实证研究对巴斯奈特²和勒菲弗尔有较大影响”（杨建华 2009：382）。在图里之后，朗贝尔是 *Target* 现任的两位主编之一，另一位译界巨擘勒内·哈瑟琳（René Haeseryn）曾长期担任 *Babel* 的主编。

1 CIUTI（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成立于 1961 年，常被译为“国际翻译学院联盟”，是国际权威教育认证组织，致力于保障高质量的职业口笔译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口笔译理论研究和人员培训。目前，我国已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五所高校成为 CIUTI 的正式成员。

2 即巴斯内特。

1.3.2 奥地利

奥地利是欧洲内陆国家，与多国接壤。1976年，联合国决议将维也纳设为纽约、日内瓦之外的第三会议中心，一批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国际组织设立于维也纳。此后，翻译成为该国的重要产业，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等院校都设有口笔译学院。它们都是国际口笔译高等教育机构常设会议组织（CIUTI）成员。奥地利重视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翻译，加速建构翻译社会学。2005年5月，格拉茨大学举办了题为“作为社会实践的口笔译”（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的国际会议，旨在推动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同年末，*The Translator* 出专刊讨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及其翻译社会学。2007年，由格拉茨大学翻译系的米凯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和亚历山德拉·夫卡利（Alexandra Fukari）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一书由本雅明出版公司出版。对此，有人称之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social turn）。

维也纳大学的斯内尔-霍恩比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或翻译文化学派在德语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是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和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的弟子，欧洲翻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收录于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文化途径”（cultural oriented approach）这一概念。

1.3.3 德国

德国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发源地。代表人物有莱斯、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Mänttari) 和克里丝汀·诺德 (Christiane Nord)。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 (text typology) 理论, 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至今在翻译界仍有影响, 其第一代代表人物如莱斯、弗米尔等已销声匿迹。人数不多, 但曾在教学和科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第二代 (如诺德等) 正在隐退。人们自然把振兴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 即往届代表人物的学生身上, 但事与愿违。诺德说: “这是因为德国学术界的情况特殊 (此处不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训练有素的口笔译者成为出色的从业人员后, 优异的工作表现带来丰厚的报酬, 使其再无任何返回学术圈的意愿。甚至有些在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研究人员也离开大学去谋求高薪岗位。” (Nord 2012: 31) 俱往矣, 曾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大本营的德国后继乏人, 就连硕果仅存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近几年也远涉重洋, 到南非、中国等地执教, 对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不显。

1.3.4 以色列

以色列是多元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的诞生地,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Zohar) 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他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系统论, 目的不单是要改善文学研究的方法, 还要修订文学的概念, 也就是修订研究对象本身 (Even-Zohar 1978: 7)。埃文-佐哈尔从多元系统论出发, 探讨译作和文学大类 (涵盖从诗歌、韵文到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之间的关系, 阐明译入语文化既决定某作品是否需要翻译, 又规范遣词造句, 并主张, “翻译属多元体系的第二体系, 作用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及其文学的强弱和发展阶段。认为, 译作无固定身份, 因其社会、文学和历史背景, 而具有多种特性 (multiple identities)” (赵家璘 1996: 47)。图

里是 *Target* 的创刊人，并从 1989 年担任主编至 2008 年，长达 20 年。该刊对当代译学研究，特别是对文化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图里沿着詹姆斯·S. 霍姆斯 (James S. Holmes) 开创的翻译研究学派的基本路线，做了大量的翻译描述和理论建设工作，被视为文化和操纵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2009 年起，图里不再担任 *Target* 的主编。由于以色列国内学界后继无人，该刊主编由学术倾向相同的比利时人朗贝尔和英国人科斯腾·马尔姆克亚尔 (Kirsten Malmkjaer) 接任。

1.3.5 芬兰

芬兰的翻译研究起步早。早在 1955 年，芬兰口笔译协会就成立了，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口笔译专门教学。1981 年起，赫尔辛基大学等开始设立翻译系或翻译学院，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大推动了翻译学术研究。芬兰学者的论文主要在 20 世纪末发表在 *Target* 上。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切斯特曼是芬兰翻译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目前仍活跃在世界译坛。切斯特曼著述颇丰，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包括：(1) 发展了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2) 创立了翻译模因论，把模因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单位；(3) 阐释了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和翻译方法论。另一位世界著名的芬兰籍德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为赫兹-曼塔利，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其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涵盖所有的跨文化转换形式。她对“翻译”和“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 进行了区分，认为翻译行为是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信息传递过程，而翻译只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翻译是翻译行为的具体操作 (Holz-Mänttari 1984)。

1.3.6 其他国家

法国、荷兰、丹麦、挪威等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翻译研究中都有一段繁荣史，多有英才活跃在世界译坛，至今仍有挪威的维尔纳·科勒 (Werner Koller)、丹麦的凯伊·道勒拉普 (Cay Dollerup) 等著名学者享誉世界。著名译学期刊 *Perspectives* 创办于丹麦，成为译界的前沿阵地。但总体而言，其光景不再。比较表 1.1 和表 1.3 可以发现，表 1.1 末尾的以色列、德国在表 1.3 并未上榜，而法国在表 1.3 中也仅位列第 10。这是因为 21 世纪以来，此三国的翻译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翻译研究式微，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盛况形成很大的反差。表 1.3 中的意大利出现在第 7 位，确有缘由。在欧洲，意大利是一个翻译大国，在其一年出版的 2 万部书籍中，翻译作品占三分之一，主要为文艺作品。意大利翻译研究也有传统，诗人、翻译家既受贝奈戴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诗歌不可译性”理论的影响，采用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又在理论上绕开“不可译”的传统论点，走向“译入语中心”。意大利等国，仍有潜势，其翻译研究发展繁荣或指日可待。

1.4 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翻译学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新兴学科，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方色彩。“与国际接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译学研究的内需动力，也是我国用较短的时间就赶上了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一时间内，期刊以介绍或阐述国外译论为主基调，“食人主义”“符号暴力”“翻译暴力”“翻译的窘境”等令人疑窦丛生的陌生词语纷至沓来，以致有学

者惊呼“乱花渐欲迷人眼”。在“引进来”的同时，通过留学访学、国际研讨等多种途径，我国学者也在努力走入国际学术前沿。

1.4.1 走向国际

20 世纪下半叶，我国“很多学者都在致力于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西方译论的引介移植或新理论的创立构建工作，有关‘中国翻译理论落后于西方’‘当前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等的理论批评也不绝于耳”（蓝红军 2015：16）。新世纪我国开启了翻译学科建设的航程，高校开设翻译专业，创立翻译硕士点。我国学者探赜索隐、蓄势突发，翻译研究论文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在上述五份国际翻译期刊 2004—2014 年所发的 628 篇论文（见表 1.1）中，中国学者发表了 96.25 篇（因与国外学者联名发表，统计中产生小数点），占 15.3%，仅次于西班牙，排名跃升至世界第二。根据王立松、张旭姣（2022：545）的统计，2005—2021 年间，14 种国际译学权威期刊的发文总量为 5,026 篇，其中中国学者贡献 606 篇，占比达 12.06%，位列世界第二。如今，中国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刊上屡见不鲜，个别学刊甚至呈高发态势，如在 *Babel* 和 *Perspectives* 发文总量中，中国学者发文占比分别高达 30.17% 和 25.88%。2014 年之前，我国学者在国际顶级翻译学术期刊如 *Target* 上发文很少，现有逐年递增之势。

1.4.2 渐入主流

中国学者开始走向国际译学前沿。王宁作为 *Perspectives* 的联合主编，先后三次编辑中国翻译思想研究专辑，其间有 20 余篇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许钧和王克非主编的 *Meta* 1999 年第 1 期《中国翻译研究专号》（*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a traduction en Chine*）用英语、

法语出版,我国 10 余位著名学者向世界介绍了国内翻译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在国际译坛上,罗进德、李运兴、林茂荪、黄友义、许钧、王宁、罗选民、黎翠珍、张佩瑶、孙艺凤、张美芳等一批学者声名鹊起,分别被聘为不同国际刊物的编委或顾问,林茂荪、黄友义、高岸明等先后担任国际译联理事或副主席。综上,无论从国际学刊的发文量,还是国际学术活动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来看,我国已开始进入国际主流阵地,在国际译学界发挥作用日益明显。

1.4.3 自主创新

历经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理论引进后,我国译界赶上了现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步伐,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这一时期,“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渐进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西学方法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特征得以张扬”(方梦之 2017: 93)。但“接轨”不是目的,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才是目的。我国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一开始就面临着吸收借鉴与本土自我之间的张力。中国翻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于本土社会,翻译研究的对象、目标和需要在本土社会,根源在本土文化传统之中。

生态翻译学由我国学者胡庚申于 2001 年提出,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理论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已趋成熟,在国内外均有影响,如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Perspectives* 前主编道勒拉普在一次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上表示,“我自己对这个新兴的、地道的中国翻译探索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Dollerup 2015: 8)。他所主编的期刊上发表了多篇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此外他还撰文在国际期刊

上介绍生态翻译学的要旨与发展。黄忠廉教授在新旧世纪之交创立了变译理论。变译理论通古今中外翻译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变译理论以中外名士的翻译变体为由头，从传统译学引入理论资源，从跨学科角度对翻译的各种变体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无论在理论创新、译学话语创新，还是方法论创新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为我国翻译研究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方梦之 2023c：7-8）。其他如我国学者提出的“应用翻译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及文章翻译学等都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建构新理论，为国际译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4.4 存在的问题

从上可知，从 21 世纪开始，我国学者的国际发文数量迅速攀升，且早已名列前茅，我国俨然已是一个翻译研究大国。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但是衡量论文质量及其学术影响力还得看文章的被引频次或引用率。引用率与国际前沿研究热点、选题方向、论文写作等都有关联。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论文的引用率尚处于低位。

1.4.4.1 引用率低

被引频次，或引用率，“是某一学科领域内学科研究人员获得同行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出该学者在学科学术群体中的信赖度与认可度，体现出论文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单宇等 2017：37）。根据王立松、张旭姣（2022：546）的数据，在发文量前十的国家中，我国学者篇均被引频次为 1.76，居末位，大大低于平均值 2.89，而澳大利亚为 4.11，比利时为 4.08，英国为 3.74，遥遥领先（见表 1.3）。这说明中国学者的论文影响力离国际平均水平

还有一定的差距。被引频次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对于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缺乏热情和对国际译学前沿课题参与度不够。据胡显耀、李茂君（2020：140）的统计，在中国学者以英语发表的译学论文所引用的9,666篇文献中，“标明作者国家的文献共7,399篇，其中前5位是：美国810篇（占11%）、英国748篇（10%）、西班牙591篇（8%）、中国485篇（7%）、加拿大332篇（4%），但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献引用率偏低，485篇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在Web of Science的总引用率为368次，平均每篇不足1次”。

为了提高引用率，中国学者往往选择追随国际译学研究前沿或讨论热点，但此举并非一定正确。例如，早在2011年，根茨勒在《翻译研究中的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Macro- and micro-tur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就提到了大至国际化运动，小至区域地方各具特色的翻译及翻译研究。此后，国外有一批选题跟进，如社区口译研究（community interpreting）一时成为热点，涉及语篇分析、质量评估、不同语境下的口译、翻译技术、翻译史、伦理、术语与词汇表、工作条件、翻译能力、培训与职业化等话题（Urpi 2012）。鉴于我国国情，“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提法对我国的翻译研究的实际意义不大。虽然翻译研究的学理相同，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的研究内容侧重点不同，甚至迥异。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视听翻译是国际讨论的一个热点，但在国内的热度不高；社区口译同样受到国际重视，但在国内基本未加讨论。据此，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既要了解引用率这一指标意义，也要立足我国实际情况，不可片面追求研究前沿或热点。

1.4.4.2 理论研究薄弱

韩子满、钱虹对21世纪以来（至2020年）14种国际译学期刊

的发文情况，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现状进行了分析，统计出中国学者的发文量达 557 篇，占总量的 9.56%，并据此认为“中国学者已经成为国际译学期刊上的主要力量”（韩子满、钱虹 2021：104）。该研究进一步对 557 篇文章的高频词做了统计，发现 theory 仅出现 66 次，与其搭配的修饰词多涉及西方翻译理论，如 polysystem theory、relevance theory、postpositive theory、Skopos theory、equivalence theory，等等。这说明，中国学者的 557 篇论文即使涉及理论问题，也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关系不大。

反差特别强烈的是，国内讨论翻译理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国际传播方面却少有耳闻。在国内，无论是研讨会或是学术报告会，我国学者大谈自创的翻译理论，翻译期刊的文章连篇累牍。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我国自命为“xx 翻译学”或“翻译 xx 学”的提法已达 70 余种（见表 7.1），还不包括不带“翻译学”字样的“译介学”“变译理论”“译学新论”“翻译批评导论”等系统研究翻译的文本。现列表展示在国外稍有影响的三种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国外被引频次，并与国内被引频次作对比（据韩子满、钱虹 2021：105）。

表 1.4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内外被引频次对比

序号	作者	名称	CNKI被引	CNKI核心被引	WoS核心合集被引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13,291	8,184	25
2	胡开宝	语料库翻译学	4,028	2,813	11
3	谢天振	译介学	17,065	2,736	4

从上表可知，国内自创的翻译理论除“生态翻译学”和“语料库翻译学”（国外引进 + 本土化的翻译学）略有国际影响外，其他都

未能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原因有两个，即理论本身的价值以及当代国际传播的充分性。其中，前者是主要原因。

我国译学在翻译与全球化、翻译职业、翻译与网络本地化、数字化翻译、翻译能力等领域的研究存在一些空白或差距。“从核心文献来看，过去 20 年以英文发表的高被引文献几乎都是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国家的学者。这一方面说明西方国家在国际译学界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译学界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胡显耀、李茂君 2020：139）近十年，我国学者已关注到国际翻译研究的前沿话题，如人工智能、翻译伦理、翻译认知、翻译技术、视听翻译等，在国内期刊上也多有讨论，但在国际论坛上拓展乏力，影响力不大。

1.4.4.3 地区差异

从数量看，我国内地的翻译教师成千上万，香港特区的学者屈指可数，人均的发文比是相当悬殊的。从发文质量来看，香港特区的学者多有英国教育背景，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熟谙前沿课题和国际学术规范，总体而言，其文章的深度和广度更令人信服。据统计，对理论表述和研究方法有较高要求的 *Target* 共发表了 8 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其中 7 篇出自香港特区的学者之手，另一篇为澳门特区的学者所撰。

翻译理论存在普遍性，但就翻译研究的整体而言，也存在国别差异。国际译学的热点话题及前沿研究方法与我国译学研究多有一致，但往往同中有异。我们既要重视国际译学的前沿研究，又不必循着西方的轨迹亦步亦趋。“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不仅仅借鉴国外 ESP 理论，其学科背景还包括文体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接受美学、文本类型学

等。”(方梦之 2012: 25) 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议题广泛, 涉及科技、商务、法律、新闻、旅游等多个领域, 学界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 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或有不同。国外根据社会需要, 以法律翻译研究为重, 我国在 20 世纪末期则更注重科技翻译研究, 随后又注重商务英语翻译研究。又如西方的口译研究有社区口译、法庭口译、医患口译等门类, 而国内一般不加细分。

1.5 小结

翻译研究从发生、发展到建立学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翻译理论、话语、概念曾一度主导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我们所关注的 21 世纪前 20 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 我国译学却已然在此期间上了一个层次。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已经确立。翻译知识生产自主的场域还在扩大。拓宽研究领域, 创新译学范畴, 反映时代特征,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 提高译学成果在国际翻译界同行中的认可度, 我国译界正在努力之中。

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学术体系, 没有自主、原创的学术体系就没有话语权。我国的翻译实践面广量大,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要将这些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必须在学术研究上多下功夫, 打造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 从而建构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实材和基础。面向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和实际问题, 论述我国译学迅速发展的理据, 建构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是译学界的责任和担当。当今, 译学界还需要更多地从学理性、通识性、公约性上打造出用于建构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真材实料”和“真凭实据”。

本章主要通过数据列表概述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及各国译学研究的概貌，特别是分析了主流国家翻译研究的特点和我国翻译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以下各章的展开，包括中国译学话语的历史分期及其发展路线，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的框架、内在关系、根本遵循、创新手段等做铺垫。